西方比较文学之“死”与中国比较文学的兴盛
——论比较文学变异学

江玉梅

© 2017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2），133–136 页

内容提要：“比较文学”从19世纪初（当这个术语最早开始运用的时候）持续至今，是一门充满激烈争论的学科。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一直伴随着比较文学的定义之争。定义之争形成了三大学科理论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在欧洲，第二阶段在美洲，第三阶段在亚洲。即：以法国学派学科理论为核心的第一阶段，以美国学派学科理论为核心的第二阶段，和以正在形成的中国学派学科理论为核心的第三阶段。在西方，法国学派注重国际文学关系史的研究，拘泥于缩小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美国学派强调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导致“无边的比较文学”，在西方学者眼中，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在衰亡，或已经“死亡”，但在东方，尤其在中国，比较文学却充满勃勃生机。以曹顺庆教授为代表的中国学派提出的“变异学”理论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开辟了一条宽广的路径。“变异学”包含跨国变异研究；跨语际变异研究；文学文本变异研究；文化变异学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五个层面的内涵。“变异学”在中西异质文明研究中，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野，不仅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实现了东西方不同文明的文论平等对话，也为世界比较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关键词：比较文学　曹顺庆　变异学　跨文明研究

WATERBASED

“比较文学”从19世纪初（当这个术语最早开始运用的时候）持续至今，是一门充满激烈争论的学科。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一直伴随着比较文学的定义之争。定义之争形成了三大学科理论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在欧洲，第二阶段在美洲，第三阶段在亚洲，即：以法国学派学科理论为核心的第一阶段，以美国学派学科理论为核心的第二阶段，和以正在形成的中国学派学科理论为核心的第三阶段。

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在发展的同时，伴随着危机。首先是圈外人对比较文学学科合理性的挑战，例如意大利著名学者克罗齐发出的挑战。他认为，比较文学随意性太大，“比较”是任何学科都可以应用的方法，比较方法不能作为比较文学学科独有的基石。随后“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这句名言成为了反击克罗齐等学者的最好盾牌。相伴而生的是法国学派的学科理论的产生，其代表人物——巴尔登斯伯格、梵·第根、卡雷、基亚等学者抛弃了比较文学的“比较”。加强比较文学的实证性，放弃无影响关系的平行比较，集中研究各国文学关系史，摆脱美学含义，取得科学含义。

针对法国学派对比较文学的阐释，美国学者雷纳·韦勒克（Rene Wellek）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意识到“比较文学的危机”。在1958年的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二届年会上，以他为代表的美国学者主张比较文学的“文学性”，因为它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是文学艺术的本质。因此美国学派建立了平行研究与跨学科研究为架构的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这套理论以“比较诗学”、“类型学”、“跨学科比较”为主，并拓展“主题学”、

比较-正文.indd 133 17-12-14 下午4:14

“文类学”等领域，大大扩展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美国学派学者亨利·雷马克（Henry Remak）认为：“比较文学是超越国界的文学研究。一方面，它研究各国文学的关系；另一方面，它研究人类知识和信仰领域内的其他学科，如艺术（绘画、雕塑、建筑、音乐等）、哲学、社会科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自然科学、宗教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既研究文学与他国文学之间的关系，也研究文学与人类其他精神领域的关系。”[1]雷马克对比较文学的定义构建了美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石，是对美国国内研究方法和研究趋势的总结。

美国学派强调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因此导致“无边的比较文学”。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欧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兴起“理论热”，从符号学到心理分析批评，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从女性主义到解构主义，从后殖民主义到文化研究，各种理论竞相纷呈、交相更替，令人目不暇接。比较文学的开放性和先锋性特点，使他敏于吸收人文社会科学的新理论、新方法。在理论大潮的推动下，比较文学研究的关注点开始发生转移，从原来的文学文本为核心的比较研究，转向了批评理论、妇女研究、符号学、电影与媒体研究以及文化研究。“以作家、作品为主的传统文学研究观念和审美问题遭到普遍拒绝，人们转而关注文学研究与人文学科之间的关系问题”。[2]比较文学转向理论研究，脱离了文学本体，关注的“是理论而不是文学，是方法而不是问题”，[3]偏离了比较文学的文学研究属性，导致了学科界限的模糊。1993年，美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伯恩海默以“世纪转折时期的比较文学”为题，发表了比较文学学科现状与发展报告。伯恩海默的报告对比较文学发展方向提出两条建议：一是比较文学应摒弃欧洲中心主义，而提倡多元文化主义，将比较文学研究范围扩大到东西方；二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关注点不应再是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而应将文学研究扩展到文本赖以产生的文化语境。进入20世纪末的时候，比较文学问题不断。比较文学的“泛文化”化，必然导致比较文学学科的危机，甚至比较文学的消亡。文学理论和后殖民理论的课程迅速增加，比较文学视作二元研究——研究两个不同文化体系的两个作家或文本，但没有界定不同文化体系，这门学科已经迷失了方向。因此国际上有学者公然声称“比较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死亡（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one sense is dead）”，“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过时（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 a discipline has had its day）”。[4]美国学者斯皮瓦克基于后殖民主义的文化立场，也宣称传统的建立在欧洲中心主义基础上的比较文学已经“死亡”。

为了化解这场危机，欧美比较文学界增强了比较文学的全球意识，开始将研究的关注点从欧洲转向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美国学者厄尔·迈纳在《比较诗学》中对中西方诗学进行比较，意大利学者阿尔多蒙·尼希提出“作为非殖民化学科的比较文学”，倡导一种革命性的西方文化的自我批评，主张西方文化必须深刻反省，并和其他文化相协作来实现比较文学的发展。伯恩海默的“学科现状报告”，提出“放弃欧洲中心论，将目光转向全球”。斯皮瓦克为垂死的比较文学学科迫切呐喊。她认为建立新型的比较文学，实现的途径是建立“星球化”（planetarity）思维模式，克服他异性（alterity），跨越边界，与区域研究（area study）相结合。

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方面源于19世纪以欧洲为中心的实证主义传统；另一方面起因于对跨文化转移的政治含义的漠视——实际上跨文化转移对任何比较活动都十分重要。比较文学关注文化研究是发展的必然，文学的内部研究只是文学研究的一方面，完整的研究，必然包括文学的外部

1 Henry Remak,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ts Definition and Function”, in Newton Stallknecht and Horst Frenz(ed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Method and Perspective*,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Press, 1961.

2 Gerald Gillespie, “Newer Trends of Comparative Studies in the West” in *Aspect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urrent Approaches*, ed. Chandra Mohan. New Delhi: India Publishers & Distributors, 1989.

3 Charles Bernheimer,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4 Susan Bassnet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UK& Cambridge USA,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3.

比较-正文.indd 134 17-12-14 下午4:14

研究。提倡比较文学研究应扩大语境化和历史化，并非要用文化研究取代比较文学，并且，“总得说来有一个共识，即文学仍处于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中心”。[1]正值比较文学这门学科在西方面临危机和衰微之际，世界很多其他地方，随着民族意识和超越殖民文化意识的增强，比较文学取得了积极进展。中国、巴西、印度以及非洲很多国家的比较文学富有建设性意义，因为学者们通过这种探究本土的和外来（强加的）传统，努力解决文学经典这个令人困扰的问题。在中国，比较文学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对西方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重新反思。在90年代，中国比较文学界就已意识到文化研究的巨大冲击和跨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针对苏珊·巴斯奈特与斯皮瓦克等西方学者“比较文学学科死亡论”的观点，中国学者曹顺庆、孙景尧、王宁、王向远等审视比较文学的发展之路，探索中国比较文学自身的复兴之路。基于与西方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需要，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基础和特色是“跨文明研究”，在中西异质文明中探索中西文学的碰撞、渗透和文学的误读、变异，寻求这种跨异质文化的文学特色以及文学对话、文学沟通和文学观念的整合与重建。“跨文明研究”将比较文学的基本立足点，由过去西方单一文化/文明圈，转移到全球不同文化/文明圈之间，倡导跨越异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这种跨越异质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与西方文化圈内的比较文学研究，有着完全不同的关注焦点，那就是把文明的差异推上了前台，更注重异质文明的撞击、对话、误读与沟通。比较文学的安身立命之处就在于“跨越”和“沟通”。

就此，中国比较文学学者曹顺庆提出“变异学研究”，他认为“不同文明中文学的异质性与变异性大于共同性，而异质性与变异性研究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也是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中一个核心问题。异质性是跨文明语境下的必然产物。变异性不仅在没有跨异质的同质文明中也存在，而且在跨文明研究中更加明显”。[2]原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立足点往往在于寻求不同国家、不同学科、不同文化中文学的相同之处，是求不同中的同；但变异学研究在于寻求不同国家文学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的变异，以及不同文明间的异质性因素，这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革命性变革。比较文学变异学是将跨越性和文学性作为研究支点，通过研究不同国家间交流的变异状态及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同一范畴上存在的文学表达的异质性和变异性，探究文学现象差异与变异的内在规律性的一门学科。

比较文学的“变异学研究”包含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跨国变异研究。例如形象的变异学研究。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就是关注形象在想象过程中产生的变异，并从更深层次的文化模式入手来分析其可能存在的变异性规律。第二，跨语际变异研究。即变异学在语言层面展开的研究，它主要研究文学现象通过翻译，跨越了语言的藩篱，最终被接受者接纳的过程。例如译介学，由传统强调“信、达、雅”转为“创造性叛逆”的突出，从最初的实证性研究转向了一种文化视野下的文学变异研究。第三，文学文本变异研究。例如文学接受研究。文学文本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点，文学文本在流通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变异也就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文学文本的变异首先是文学文本在实际交往中产生的文学接受现象。文学接受的过程含有美学和心理学因素，文学文本变异学还包括主题学和文类学的研究。通过不同的文学主题和文类变异现象的研究，可以有效展开不同文明体系间的文学对话，从而更有效地总结人类的文学规律。第四，文化变异学研究。例如文化过滤。文学在不同文化体系中穿越，必然要面对不同文化模式的问题。文化过滤是指文学从传播方转向接受方的过程中，接受方基于自身文化背景而对传播方文学所作出的选择、删改、创新等一系列的行为。文化过滤后会有文学误读现象。第五，跨文明研究。主要的理论是文明对

1 Manuela Mourao,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Culural Studies*, ed. Steven Totosy de Zepetnek, Indiana: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2003.

2 曹顺庆，《比较文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比较-正文.indd 135 17-12-14 下午4:14

话与话语变异的问题。当一种文学理论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这种理论话语必然产生变异。例如西方文论到达中国，会产生两种变异。首先是中国文论的西方化现象，造成中国文论的“失语”状态；其次西方文论自身的变异，即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跨文明研究中话语变异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学者提倡的“阐发法”，即异质文明之间是可以相互阐发的。[1]

比较文学的“变异学研究”对全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和价值。“变异学研究”一方面有机结合了文学跨越研究和文学审美性研究，另一方面，“变异学研究”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重大突破。“话语变异”促使中国文论和西方文论的碰撞时，产生了新的东西。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可以平等对话，中国文论应以自己特有的文化精神来言说当今的学术问题，展现中国文论的自我魅力。

纵观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比较文学学科一直备受争议，并伴随着危机。在西方，法国学派注重国际文学关系史的研究，拘泥于缩小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美国学派强调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导致“无边的比较文学”，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在衰亡，或已经“死亡”，但在东方，在中国，比较文学却充满勃勃生机。在全球多元文化的语境中，变异学理论的提出，弥补了法国学派影响研究和美国平行研究的重大遗憾。开启了跨文明比较研究的新历程，实现了东西方不同文明的文论平等对话。

（作者单位：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WATERBASED

1 曹顺庆，《比较文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比较-正文.indd 136 17-12-14 下午4:14